

潮州方言咸、深攝韻尾 [-m] → [-ŋ]、[-p] → [-k] 的音變模式及其成因

徐宇航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提要 當代潮州方言咸、深攝字音存在[-m]、[-p]、[-ṽ]、[-ʔ]、[-ŋ]、[-k]六種韻尾形式。[-m]、[-p]、[-ṽ]、[-ʔ]較穩定存在，而[-ŋ]、[-k]多是後起形式，為[-m]→[-ŋ]、[-p]→[-k]音變的結果。本文從語音學、詞彙學等多個角度探討潮州方言咸深二攝字音韻尾中[-m]→[-ŋ]、[-p]→[-k]變化發生的原因、規律和趨勢，為進一步研究粵東閩語語音系統及其演變提供方法和實例的借鑒。

關鍵字 潮州方言、咸深攝韻尾、音變模式

一 引言

韻尾的分合在漢語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表現。當代潮州方言¹咸、深攝字音存在[-m]、[-p]、[-ṽ]、[-ʔ]、[-ŋ]、[-k]六種韻尾和韻尾弱化形式。這六種韻尾形式的分佈在不同音韻條件、詞彙以及交際中有獨特的表現。其中，[-m]、[-p]、[-ṽ]、[-ʔ]較為穩定存在，而[-ŋ]、[-k]多數是後起形式，實際上為[-m]→[-ŋ]、[-p]→[-k]音變的結果。該音變與方言使用者的年齡、生活區域等社會語言學因素密切相關。同時，該音變的發生，也有著必然的語音因素。對它們的探討，於構建潮州方言的韻尾層次，理解語音變化的規律等方面，都存在積極的意義。

二 韻尾的分佈

在潮州方言咸、深攝字中，韻尾的分佈與韻母類型存在對應關係。具體的韻攝與韻母分佈對應關係如下：

咸攝開口一等單合、談盍韻：[am]、[ap]；

咸攝開口二等咸洽、銜狎韻：[am]、[iəm]、[ap]、[iəp]²；

咸攝開口三等鹽葉、嚴業韻：[iəm]、[iəp]；

¹ 從方言學角度來說，潮州方言(潮州話)這個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角度上所講的潮州方言即粵東潮汕地區閩語，狹義角度上所說的潮州方言則是潮州市區，即當代意義上潮州市所使用的方言。本文研究的潮州方言著眼點是潮州市區方言，即狹義的潮州話。

² 潮州市區話實際讀音為[iəm]、[iəp]，而[iəm]、[iəp]實際為[iam]、[iap]變化而來，在當代與潮州毗鄰的汕頭地區，[iəm]、[iəp]仍讀為[iam]、[iap]音。

咸攝開口四等添帖韻：[iəm]、[iəp]；

咸攝合口三等凡乏韻：[uam]、[uap]；

深攝開口三等侵緝韻：[im]、[am]、[iəm]、[ip]

從韻攝與韻母類型的對應關係來看，咸深二攝字音韻尾類型可分為以下四類：第一類為 [am]、[ap]；第二類為 [iəm]、[iəp]；第三類為 [uam]、[uap] 以及第四類 [im]、[ip]。以下根據《方言調查字表》所收錄的常用字，對咸深兩攝所轄漢字的韻尾情況作相關討論。

在此討論中，我們以正式語體³調查中發音人對 [-m]、[-p] 韻尾的不同讀音情況，將字音中已變和正在變的漢字列出，以此看出韻尾演變與韻母之間的關係⁴。

	已變	正在變
[am]	毯	潭、簪
[ap]	劄	答、鴿、喝、搨、眨
[iəm]	臉、眨	
[iəp]	跌	妾、怯
[uam]		凡、范、範、犯、泛
[uap]	乏	法
[im]	粟、品	臨、侵
[ip]	螿	緝、習、襲

從表面上看，咸深二攝字音韻尾在 [-m] → [-ŋ]、[-p] → [-k] 變化類型上呈現的規律性不強，各種韻母類型都有相應的漢字發生音變，但比照《方言調查字表》所轄漢字，我們便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第一，在 [-m] → [-ŋ]、[-p] → [-k] 變化中，走得最快的韻母類型應該是 [uam]、[uap]，《方言調查字表》所轄的該類型所有漢字，均在調查中處於正在變化狀態：從年齡角度講，除了出生於 50、60 年代的少數發音人在讀音中保持 [uam]、[uap] 外，其他多數發音人已經將其讀為 [uaŋ]、[uak]；從區域差別角度講，除了少數出生並成長於舊城區的發言人保持相對完整的 [uam]、[uap] 外，其他多數發音人已經將其讀為 [uaŋ]、[uak]。除此之外，其他韻母類型漢字對 [-m]、[-p] 韻尾語音特徵都有較大的保留。第二，[iəm]、[iəp] 類型的漢字在變化中呈現並非簡單地由鼻音、塞音韻尾脫落轉為鼻化元音和喉塞韻尾，而是在韻母類型上有一定的整合情況，比如「眨」字，在完成 [-m] → [-ŋ] 轉變的同時韻母也讀為 [iŋ] 而非 [iəŋ]。

整理韻尾存在情況的同時，我們發現，在咸深攝字音韻尾變化的過程中，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是否是平行發展，可以從數據中得到一些線索。綜合我們的調查結果，我們得到以下兩組數據：

³ 正式語體指的是：語言使用上的一種功能變體，指在一些正式的、莊重的場合使用的語言形式，具有規範、嚴謹、莊重的特徵。在此語體下的發音會比較清晰，發音人會注意自己的語音特點。參考唐作藩主編，《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香港：遠帆世紀出版社、中華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799頁。

⁴ 所謂已變、正在變和未變，是因發音人在正式語體調查中對 [-m]、[-p] 韻尾讀音的不同表現而分的。出生於 20 世紀 50、60 年代發音人已明確不讀 [-m]、[-p] 韻尾的，我們稱之為已變讀音；出生於 20 世紀 50、60 年代發音人在 [-m]、[-p] 韻尾讀音的表現上處於搖擺狀態的，我們稱之為正在變讀音；出生於 20 世紀 50、60 年代發音人明確讀 [-m]、[-p] 韻尾，70 年代以後的發言人才有較大變化的，我們稱之為未變讀音。下同。同時，在表格中我們剔除了方言少用字和多數發音人無法讀出的漢字。最後，在表格中，有異讀情況的字若保留輔音韻尾，我們也按其讀音將其歸入不同演變類型。

韻攝	保留[-m]	陽聲韻字	百分比	保留[-p]	入聲字數	百分比
字音總數	170	187	90.9%	58	88	65.9%

本圖表的統計以實際調查為準，採取較為保守的統計方式，即在調查中老派發音人能保持較好的[-m]、[-p]韻尾語音特徵，我們便將其列為保留[-m]、[-p]韻尾漢字，如若在實際調查中老派發音人也沒較大幅度保留[-m]、[-p]韻尾的漢字，我們才將其視為已經變化了的字音。從統計圖表我們可以得知，第一，潮州方言咸深兩攝字音韻尾中，老派發音人對[-m]、[-p]韻尾語音特徵的保留相對較為完整。陽聲韻字達到 90.9% 的韻尾保留，入聲字也有 65.9% 的韻尾保留，而今，這些保留也逐漸發生了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

由此，在韻尾保留的程度上，潮州話顯示出來的陽聲韻要比入聲韻保留程度大。這點對「鼻音塞音韻尾發展學說」將是一個補充。陳淵泉曾提出「鼻音塞音平行發展學說」⁵，認為漢語方言中鼻音、塞音韻尾的變化有著相同的模式和規律，兩者之間平行發展，共同變化。後來張光宇又提出了與之相反的學說⁶，認為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塞音韻尾的發展是不平行的，塞音尾的演變總要快於鼻音尾，並以贛語的輔音韻尾演變歸納出一個趨勢，即鼻音尾比塞音尾保守⁷。針對上述兩種觀點，結合上面對潮州方言咸深二攝鼻音塞音韻尾在當代語音系統中的存留統計情況，我們可以得知，陳先生和張先生兩種觀點的差異，實際上是研究方法的差異所致。陳先生用的方法屬於傳統方言學所採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從變化的本質出發，因此得到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在變化上是同時的，進而從這點上得出它們的變化是並行的，並非一個變化，一個不變這樣的結論。但定性研究缺乏量化統計的方法，因此陳先生的結論沒有說明到底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是否在變化程度上也是平行的。而張先生的研究則是帶有量化統計的色彩，通過對方言中韻尾存留的情況做具體的統計，得到其變化程度並非平行，而是有快有慢這樣的結論。現在我們用定性研究結合量化統計的方法對潮州方言咸深二攝鼻音、塞音韻尾存留情況進行探究，可以得到，從質變的角度上講，潮州話顯示出來的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都發生了變化，並非一個變化，一個不變，因此它們的變化有平行的蹤跡。但從量化角度來講，潮州方言的咸深兩攝鼻音韻尾、塞音韻尾的變化並不是處於同樣的演變程度。在演變程度上，塞音韻尾比鼻音韻尾要走地快一些，也就是張先生所說的「鼻音尾比塞音尾保守」。

三 咸深二攝韻尾[-m]→[-ŋ]、[-p]→[-k]音變模式原因分析

關於音變的起因，學界至今存在爭議，解釋音變起因的理論也不多。同時，音變的原因往往不是單一的，從語音學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從發音方法、發音部位、語流音變以及音系結構等多個角度看待潮州方言咸深二攝韻尾的存變關係。從詞彙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考察音變與詞頻、詞彙語用等情況的關係。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出發，我們又可以從社會角度探討語言演變的成因。語音學原理為音變提供了可能性，而音變的發生則與其在整個音系結構中的位置相關，詞彙的語用情況及其使用頻率也與音變的模式有密切的聯繫。同時語言接觸對語言變化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因此要對一個語言變化現象作較為全面的考量，必須從多個角度進行分析。

⁵ 參考 Matthew Chen.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38-63.

⁶ 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第 36 屆國際和藏語言學會議論文，2003 年。

⁷ 參考邱仲森，〈廣東興寧羅浮客家話韻母演變試析〉，載張雙慶、劉鎮發主編，《客語縱橫——第七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08 年，第 83-99 頁。

3.1 從語音學角度看韻尾的變化

運用電腦、聲學儀器等現代科技手段通過分析語音、發音器官等方式對發音原理、語音特徵進行解釋是現代語音學對語言學的重要貢獻。從語音學角度出發，往往可以解釋語音變化的動因、模式和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就上文所總結出來的[-m]→[-ŋ]和[-p]→[-k]音變，從語音學角度分析，它們變化的原因可以概括為語音相近、制約原則這兩條規律。具體來說，語音相近提供了語音轉化的可能，但僅有變化的可能往往不夠，這就是後文所講的語音間相互制約的意義之所在。

3.1.1 語音相似

「相似性在語音演化的分析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因為相似性跟起源和發展相關(類型也可以造成相似)。」⁸簡單地說，語音相近，或者說語音之間有共性特徵，為語音之間的轉化提供了可能性。[-m]和[-ŋ]的不同，主要是發音部位⁹的不同。它們在發音方法¹⁰上是一致的，都屬於鼻音韻尾。也就是說，[-m]和[-ŋ]發音時候氣流都需要通過鼻腔，[-m]因為發音器官¹¹在口腔的雙唇部位，比[-ŋ]多了一個「閉口」的生理動程。發[-m]的時候如果把發音部位往後移，就可以得到[-ŋ]，兩個有共同發音方法的韻尾相互轉化，這在發音原理上講得通。也就是說，[-m]與[-ŋ]在語音上有較大的相似度，[-m]→[-ŋ]的演變屬於鼻音韻尾之間的轉變，並沒有變更發音方法，只是在發音部位上作了移動。

同理，[-p]與[-k]具有相似發音特徵，在發音方法上它們都是不送氣的清塞音韻尾，其不同在於發音部位。類似於[-m]和[-ŋ]，如若在發[-p]的時候發音部位向後推移，就可以得到韻尾[-k]。[-p]→[-k]是入聲舒化的合理路徑，在漢語諸方言中時有發生¹²。潮州話[-p]→[-k]作為韻尾的變化類型，正好為[-p]舒化提供了演變階段的可能性解釋。同時，比照漢語其他方言，我們不可否認[-p]韻尾變為[-k]韻尾之後，將有可能進一步弱化甚至消失，最終達到入聲舒化。

3.1.2 制約原則

經過分類分析發現，咸深兩攝字音韻尾變異與該字的聲母、韻母介音分佈也有密切的關係。聲母、韻母介音與韻母主元音之間的相互制約對韻尾的演變存在影響。在調查中我們發現，[-m]→[-ŋ]、[-p]→[-k]的變化中，雙唇韻尾變化程度最大的[uam]、[uap]韻母類型漢字，如咸攝合口三等的「凡」、「范」、「範」、「犯」、「泛」、「乏」、「法」，這些字都帶有唇音介音[u]。同時，韻攝中已經完成[-m]→[-ŋ]變化的少數字音如「貶」、「稟」、「品」，聲母屬於「幫組」，是唇音聲母字。由於已完成[-m]→[-ŋ]變化的少數字和調查中老派發音人也開始產生變化的字音都集中在唇音字上，我們可以得知，唇音聲母或介音在[-m]、[-p]韻尾語音特徵的變化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唇音字率先發生了韻尾變化，是唇音聲母或介音與雙唇韻尾之間發

⁸ 江荻，《漢藏語言演化的歷史音變模型——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03頁。

⁹ 發音部位指的是發音時候發音器官的哪一部分發生阻礙。參考羅常培、王均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87頁。

¹⁰ 發音方法指的是發音時候構成阻礙和克服阻礙的方式。參考羅常培、王均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87頁。

¹¹ 語音的生理基礎是發音器官。人類的發音器官包括呼吸器官，聲帶，口腔和鼻腔、咽腔、喉頭幾部分。本文所探討的發音器官主要集中在與語音變化相關的口腔和鼻腔部分。參考羅常培、王均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8-58頁。

¹² 如北方漢語東干語等就曾歷經[-p]到[-k]演變。詳見橋本萬太郎著，余志鴻譯，《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81頁。

生的異化作用使然。首先，像「眨」、「稟」、「品」這樣的字，在潮州話中讀[p]或[pʰ]聲母。聲母是送氣或不送氣雙唇塞音，韻尾如若又是鼻音或塞音的雙唇韻尾，在發音時候就容易顯得「繞嘴」¹³，人們在日常說話中為了避免發音的麻煩容易將其中的一個雙唇音發成其他的音，因此也就有了雙唇韻尾[-m]向[-ŋ]導轉變。這是異化作用促使語音產生變化的個案之一。而這部分的字音韻尾變化，早在唐宋時期已經完成。王力也在《漢語音韻》中提到：「閉口韻在北音中大約在 16 世紀以前就消失了。」¹⁴同時，我們再來看看咸攝合口三等的「凡」、「范」、「範」、「犯」、「泛」、「乏」、「法」等字。這組字在當代潮州話里都帶介音[u]。按照異化作用的原理，即如羅常培所說「異化作用就是為了避免發音時繞嘴才產生的」¹⁵，此時韻尾與介音同為唇音，因而[-m]、[-p]韻尾變成[-ŋ]、[-k]韻尾同樣可能是因為韻尾受到介音的影響，產生異化。在此，語音間的制約作用為[-m]→[-ŋ]、[-p]→[-k]的變化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

3.2 從詞彙角度看詞頻、詞彙異讀情況與韻尾變化的關係

從詞彙角度出發，探討影響詞彙語音變化的問題早在 19 世紀已經成為語言學界研究的課題。Schuchardt(1885)認為影響詞彙語音變化是詞頻，他認為使用頻率高的詞(以下稱高頻詞)變得快，使用頻率低的詞(以下稱低頻詞)變化比較緩慢¹⁶。相反的，20 世紀語言學家 Hopper(1976)、Phillips(1981)提出低頻詞也可能最先產生變化的觀點。其中 Phillips(1984)認為音變規律可能最先影響高頻詞，也可能自低頻詞開始，其關鍵在音變的動因為何。由語音因素造成的音變先影響的是高頻詞，由概念因素所造成的音變則最先影響低頻詞(Phillips 1984: 320)。¹⁷這樣的結論卻與王士元(2002)觀察到的現象不符。在王先生的材料中，某個詞的變與不變因人而異，先變的是可能是使用頻率低的詞，也可能是使用頻率高的詞。對這種現象，他作出的解釋是：一般來講，使用頻率較高的詞的音系地位要較使用頻率較低的詞來得明確。當說話者要保持原有讀音時，使用頻率高的詞就相對容易些，而使用頻率低的詞就困難些，這就在音變中形成了變化上的先後。反之，當說話者出於某些原因有意要改變原有語音時，使用頻率高的詞也就更有機會被改變。這樣，變化的次序和使用頻率高低之間的關係，應該與說話者的心理意願有直接的關係，而不僅僅是以語音或非語音為條件。¹⁸與此同時，陳淑娟則進一步對詞頻與詞彙使用範圍進行界定，提出「高頻詞因使用範圍的不同，有快慢兩極的變化：日常生活常用且各地普遍使用之常用詞，變化較快，此乃因這些詞較常接受外來語音影響的緣故；相對的，語言社群當地特有、與當地生活文化密不可分的常用詞音變最慢，因此反而頑強地固守地方方音，不易改變」¹⁹。

¹³ 羅常培、王均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第 181 頁。原文為：「異化作用就是為了避免發音時繞嘴才產生的。」

¹⁴ 王力著，《漢語音韻》，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2 月新版，第 68 頁。

¹⁵ 羅常培、王均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第 181 頁。

¹⁶ 引自 Phillips, Betty. 1984. Word frequency and actuation of sound change. *Language* 60: 320-342.

¹⁷ 參考 Phillips, Betty. 1984. Word frequency and actuation of sound change. *Language* 60: 320-342 和陳淑娟，《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一二五)，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2004 年 10 月，第 114 頁。

¹⁸ 參考王士元，〈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載王士元，《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第 117-146 頁。

¹⁹ 陳淑娟，《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一二五)，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2004 年 10 月，第 115 頁。

針對以上幾種關於詞頻與詞彙變化的理論，結合筆者對潮州話咸深二攝字音唇音韻尾變化的調查，我們認為，結合詞頻和詞彙的不同使用範圍進行分類是必要的。在調查中我們發現，總體上來講，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彙變化也相對比較快。但是，在調查中我們也發現，某些使用頻率非常高，在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每天都用到的詞彙，反而很少發生語音上的變化。因此，結合詞頻與使用範圍的不同對詞彙進行分類，將對分析及探討語音的變化規律有較大益處。結合上述各種理論，對詞彙使用頻率，筆者作了以下分類：首先，按照詞彙使用的頻率，詞彙可分為高頻詞與低頻詞；同時，按照詞彙使用範圍與其使用頻率，詞彙又可以細分為通用高頻詞、特有高頻詞與通用低頻詞、特有低頻詞四類。結合具體語言背景，簡單來說，通用高頻詞指的是潮州話與通用語漢語普通話中表達一致並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使用的詞彙；特有高頻詞則是潮州話特有並經常使用，而漢語普通話沒有的詞彙；通用低頻詞指的是潮州話與漢語普通話中都有，但不經常被使用的詞彙；特有低頻詞則為潮州話特有而漢語普通話沒有，同時日常生活中也不常用的方言詞彙。

在[-m]→[-ŋ]、[-p]→[-k]的變化中，調查結果顯示：在我們所區分的潮州方言通用高頻詞、特有高頻詞、通用低頻詞、特有低頻詞四類詞彙中，[-m]、[-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度最高要屬方言特有高頻詞。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在咸深二攝多數字音[-m]、[-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度非常低的出生於20世紀80、90年代和出生並成長與潮州新城區區域的發言人，對潮州方言特有又極為常用的方言特有高頻詞還依舊可以保持[-m]、[-p]韻尾語音特徵。以潮州話特有且常用的帶[-m]韻尾語音特徵的[am]（本字為「飲」，意為米湯）、[tim]（意為加熱流質食物）和常用否定詞[m]（「唔」，意為不行、不可等）為例，調查中我們發現，在正式語體調查，51位發音人的語音資料中，[am]僅有8位發音人將其讀為[an]，[tim]僅有11位發音人將其讀為[tiŋ]，[m]則沒有任何一位發言人將其讀為[ŋ]。由於經常使用，並且在通用語漢語普通話中沒有相應的表達方式，人們對這些詞彙的習得一般通過長輩的影響進行，這使得該類詞彙的語音得以保持得較為穩固。這樣的事實與王士元先生所提到的「一般來講，使用頻率較高的詞的音系地位要較使用頻率較低的詞來得明確」是相吻合的。與此同時，方言特有的低頻詞在對咸深二攝字音[-m]、[-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程度上也相對較高。在調查中我們發現，51位參與正式語體調查的發言人中，像[t^hiəm]（意為腳用力往下踩，較粗俗，日常少用）這樣的詞彙，也僅有15位發音人將其讀為[t^hiŋ]，某些年紀較輕的發音人一時想不出該詞彙的發音，在筆者進行提示之後，還是能將[t^hiəm]讀出來，問其是否能讀為[t^hiŋ]，發音人覺得可以接受，但沒有[t^hiəm]來得自然。這說明方言特有低頻詞雖然在日常的使用中出現的頻率不高，音系地位沒有高頻詞那樣明確，但由於它屬於方言特有詞彙，通用語中沒有能與之完全同義的表達與其混淆，因此在語音上仍舊可以保持原貌。

在調查中發現，變化較大的要屬通用高頻詞和通用低頻詞。由於通用語漢語普通話有相同的詞彙，這兩類詞的讀音往往在年輕人身上起了較大的變化。筆者從作為潮州話母語使用者的固有語感和調查兩方面出發，隨機選取9個相對高頻詞和9個相對低頻詞²⁰進行比較統計，結果如下：

²⁰ 高頻詞和低頻詞是一對相對的概念，沒有絕對的高頻詞或低頻詞。Phillips(1984: 336)也曾指出：Word frequency, like most phenomena, varies with space and time: the frequency of particular will vary slightly from speaker to speaker and from speech community to speech community. 由於潮州方言目前沒有已建立的關於詞頻的語料庫，因此本文所言的高頻詞和低頻詞，主要基於以下兩點確定：一，筆者的母語是潮州話，因此按照自己語感加之調查中的實際情況，對詞彙進行選擇；二，根據調查中發音人對詞語的反應情況，如果一個詞語多數發音人無法讀出，即為低頻詞，反之則為高頻詞。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詞彙的高頻低頻之分，是個相對概念，跟個人的生活環境有很大關係。同時，不同方言的高頻、低頻詞也未必一致。

通用高頻詞對[-m]、[-p]韻尾語音特徵待保留度²¹：

詞語	貪心	藍色	車站	檢查	店鋪	複雜	作業	十萬	出入
保留度	42.6%	40.7%	34.6%	42.6%	45.3%	35.2%	50%	31.5%	37%

平均保留度為：39.9%。

通用低頻詞對[-m]、[-p]韻尾語音特徵待保留度²²：

詞語	神龕	酣睡	咸豐	國子監	劍術	便捷	協商	緝拿	哭泣
保留度	55.6%	57.1%	42.9%	41.2%	64.2%	51.9%	53.8%	36.4%	46.2%

平均保留度為：49.9%。

從統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通用高頻詞還是通用低頻詞，它們在[-m]、[-p]韻尾語音特徵上都有較大的變化，其中通用高頻詞僅有 39.9% 的保留度，通用低頻詞僅有 49.9% 的保留度。較之方言特有詞彙的保留度有很大的差距。同時，我們使用進行連續修正的 wilcoxon 秩和檢驗法，對整體上高頻詞與低頻詞間是否存在保留度的差異進行檢驗(檢驗在統計軟體 R 中完成，版本為 2.8.1²³)。經過統計檢驗，我們發現，高頻詞和低頻詞的保留度有顯著差異([W=13, p<0.01])。通用低頻詞較之通用高頻詞對[-m]、[-p]韻尾語音特徵的保留度要高，保留[-m]、[-p]韻尾語音特徵程度較高的「劍術」、「酣睡」、「神龕」等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較少使用的詞彙。

因此，通過對比和統計方言特有高頻詞、特有低頻詞、通用高頻詞、通用低頻詞四類詞彙對咸深二攝字音[-m]、[-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度，我們可以看出，在潮州方言中，咸深二攝字音[-m]、[-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最高的是方言特有高頻詞，其次是方言特有低頻詞，第三屬於通用低頻詞，保留度最低的應屬通用高頻詞，即在潮州方言對咸深二攝字音[-m]、[-p]韻尾語音特徵的保留上，特有高頻詞>²⁴特有低頻詞>通用低頻詞>通用高頻詞。從這樣的分析結果我們又可以得知，方言特有詞彙和方言與通用語共有的詞彙在詞頻與變化程度上呈現兩種不同的變化規律，方言特有詞是低頻詞變得快，方言與通用語共有的詞彙是高頻詞變

²¹ 其中帶[-m]的漢字有：貪、心、藍、站、檢、店；帶[-p]的漢字有：雜、業、十、入。

²² 其中帶[-m]的漢字有：龕、酣、咸、監、劍；帶[-p]的漢字有：捷、協、緝、泣。

²³ 由於樣本量不夠大(每組僅有 9 個詞)，因此我們採用 Wilcoxon 秩和檢驗。完全隨機設計兩個獨立樣本比較的 Wilcoxon 秩和檢驗，目的是推斷兩樣本分別代表的總體分佈是否不同。Wilcoxon 秩和檢驗的基本思想是：假設兩總體分佈相同(H₀)，兩樣本可認為是從同一總體中抽取的隨機樣本；將二者混合後由小到大編秩，然後分別計算兩樣本組的平均秩和 R_{1a} 與 R_{2a}，R_{1a} 與 R_{2a} 應大致相等，其差別是由於隨機抽樣引起；如果按上述方法計算的兩樣本平均秩和 R_{1a} 與 R_{2a} 差別很大(p-value<0.01)，我們就有理由認為 H₀ 不成立。檢驗程序如下：

```
> x <-c(42.6,40.7,34.6,42.6,45.3,35.2,50,31.5,37)
> y <-c(55.6,57.1,42.9,41.2,64.2,51.9,53.8,36.4,46.2)
> wilcox.test(x,y,alternative="less",exact=FALSE)
```

Wilcoxon rank sum test with continuity correction

```
data: x and y
W = 13, p-value = 0.00853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location shift is less than 0
```

²⁴ > 表示大於。

得更快些。因而通過對不同音變類型的分析，看似錯綜複雜的詞頻與音變關係也就有了清晰的線索。

3.3 其他因素對韻尾演變的影響

最後，在對潮州方言咸深二攝字音韻尾演變原因的討論上，我們也不能忽略語流以及方言間的接觸對語音演變的影響。從語流導致音變的角度上講，在調查中我們知道，自由語體²⁵中發音人對[-m]、[-p]語音特徵的保留總是要比正式語體「以字讀字」調查來得少。造成這個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自由語體的對話或問答中，發音人所說的話經常受到語流音變²⁶的影響，韻尾產生弱化甚至脫落。語流中詞彙本身的語音準確度並沒有「以字讀字」時候重要，因為語流中的詞彙意義可以通過語境、句意等方式加以明確，此時說話人只要把詞語「大概說出」，聽話人一般都可以明白對方的語義，因而人們「能省則省」。以潮州話的所說的「十塊錢」為例，潮州話說「十塊錢」為[tsap₂ kai₂ ɲəŋ]²⁷(十個銀)。但在實際說話中，只要發音人說話速度略快一點，[tsap₂ kai₂ ɲəŋ]經常會變成[tsa₂ ai₂ ɲəŋ]，此時第一個音節的韻尾和第二個音節的聲母發生脫落，在語流中形成「減音」²⁸現象，使[-m]、[-p]韻尾語音特徵消失。

從語言接觸導致音變的角度上講，具體到[-m]、[-p]韻尾，語言接觸對[-m]→[-ŋ]、[-p]→[-k]的變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李永明、林倫倫、潘家懿等學者的著作中提到，澄海、潮安縣等某些地區，咸深二攝韻尾在當代都讀[-ŋ]、[-k]韻尾。隨著這些地區居民的遷徙進入潮州市區，把其方言的特徵也帶來。通過與潮州市區居民的接觸，漸漸影響了市區人的發音。同時，通過移民、通婚等因素，這些人的後代在潮州市區方言與父母原有方言的雙重影響背景下成長，其[-m]、[-p]韻尾語音特徵的認識也較為模糊，因而以一傳百，對[-m]、[-p]韻尾產生變化，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四 結語

作為韻母系統較為複雜的潮州方言，由於語音自身的演變和方言之間的相互接觸使其韻母系統在當代產生了相應的變化。本文從語音學、詞彙學等多個角度探討潮州方言咸深二攝字音韻尾中[-m]→[-ŋ]、[-p]→[-k]變化發生的原因、規律和發展趨勢。對這種韻尾演變類型的解釋，填補以往潮汕方言研究空缺的同時也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粵東閩語語音系統及其演變提供了方法和實例的借鑒。

²⁵ 自由語體是與正式語體相對的一個概念，也稱非正式語體。是語言使用上的一種功能變體，指在非正式場合使用的語言形式。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話，如聊天、家庭內部談話、以及吵架等基本上都屬於非正式語體範疇。非正式語體具有隨便、簡易、直白的特徵。在此語體下發音人一般不會留意到自己發音的特點。參考唐作藩主編，《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香港：遠帆世紀出版社、中華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76頁。

²⁶ 語流音變指的是一個語音和其他語音組成一串連續的音時，難免互相影響，於是就產生了語音的變化。參考羅常培、王均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71頁。

²⁷ [tsap₂ kai₂ ɲəŋ]中第一、二個音節發生變調，本文注變調前的調類。

²⁸ 在一串語音連續發出時，有時會發生因素的減少現象，這種現象叫做音的減少，簡稱減音。參考羅常培、王均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91頁。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潮劇志》編輯委員會. 1995. 《潮劇志》。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 2003. 《潮州史志資料選編·古城概覽》。潮州：地方志辦公室。
- 潮州市地方志編輯部. 1995. 《潮州市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陳淑娟. 2004.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一二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陳曉錦. 2001. 〈廣東粵語的鼻音韻尾和入聲韻尾〉，《方言》2: 171-177。
- 何大安. 2004.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江荻. 2002[2006]. 《漢藏語言演化的歷史音變模型——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探索》。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永明. 1959. 《潮州方言》。北京：中華書局。
- 林倫倫. 1996. 《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倫倫、陳小楓. 1996. 《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羅常培、王均. 2004. 《普通語音學綱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潘家懿. 1998. 〈鼻塞韻尾的消變及其粵東閩語模式〉，《語文研究》4。
- 橋本萬太郎著，余志鴻譯. 1985. 《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邵慧君. 1993. 〈粵方言陽聲韻尾及入聲韻尾的分化模式及成因初探〉，《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61-277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力. 2007. 《漢語音韻》。北京：中華書局。
- 王士元. 2002. 《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光宇. 2003.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第 36 屆國際和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張洪年. 2003. 〈21 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129-152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張雙慶、劉鎮發主編. 2008. 《客語縱橫——第七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朱曉農. 2006. 《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曉農、焦磊等. 2008. 〈入聲演化三途〉，《中國語文》4。
- Chen Matthew. 1975.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 16-59.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adefoged Peter. 2001. *A Course in Phonetics*.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4th edition.
- Ladefoged Peter. 2001.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s of Language*. Malden, Mass: Blackwell.
- Ladefoged Peter and Maddieson Ia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Blackwell Publishers.
- Phillips Betty. 1984. Word frequency and the actuation of sound change. *Language* 60: 320-342.
- Wang, W.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 9-25.

Change Patterns and Causes of [-m]→[-ŋ] and [-p]→[-k] in Xian and Shen Rhyme Groups of the Chaozhou Dialects

Xu Yuhang

Abstract Xian and Shen rhyme groups of Chaozhou dialects consist of [-m], [-p], [-v̄], [-ʔ], [-ŋ], [-k] forms. While [-m], [-p], [-v̄], [-ʔ] are more stable, [-ŋ], [-k] are evolved as a result of the sound change: [-m]→[-ŋ], [-p]→[-k]. In this paper, phonetics, lexicology and many other perspectives are used to analysis [-m]→[-ŋ], [-p]→[-k].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throw light on further study of Min dialect.

Keywords Chaozhou dialects, finals of Xian and Shen rhyme groups, mode of sound change